

石黑一雄《上海孤儿》中的家园政治

王卫新

内容摘要：公共租界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上海孤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淞沪会战之前的租界是生长于上海的英国著名侦探班克斯的精神家园，班克斯母亲投身反鸦片运动为旅居上海的英国人披上了正义的外衣；战时的租界成为所有人心目中的安全港湾，而苏州河对岸战火正酣的闸北则是龙潭虎穴。战前的租界被上海民众视为“外国人的城市”，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备受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的欺凌，但战时的公共租界也为躲避战乱的中国人提供了庇护。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间未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租界地区被称为孤岛，孤岛和石黑一雄小说中的孤儿遥相呼应，孕育着一种十分复杂的、风云变幻中的上海的家园政治。

关键词：《上海孤儿》；公共租界；家园政治；鸦片贸易；抗日战争

作者简介：王卫新，文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

Title: The Politics of Home in Kazuo Ishiguro's *When We Were Orphans*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Kazuo Ishiguro's *When We Were Orphans*. Prior to the Japanese assault on Shanghai in 1937,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served as the homeland of Christopher Banks, the Shanghai-born British detective. Banks' mother's anti-opium campaign justified the presence of British expatriates in Shanghai. In wartime Shanghai, the Settlement became a safe haven for all. Chapei, the very place of heavy fighting on the other bank of Suchow Creek, became an inferno for British expatriates. In Chinese people's eyes, the prewar Settlement was "foreigners' city", in which Chinese people were bullied and humiliated by imperialists headed by the British. In wartime Shanghai, however, the Settlement became the sanctuary of Chinese refugees. The unoccupied area in Shanghai was known as *Gudao* (solitary island) from November 1937 to December 1941. *Gudao*, together with *Gu'er* (orphan), represented very sophisticated politics of home in tumultuous Shanghai.

Key words: *When We Were Orphans*;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politics of home; opium trade; Anti-Japanese War

Author: Wang Weixi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conomy. Email: wilson69@163.com

2002年1月,由陈小慰翻译的、英国当红作家石黑一雄的新作《当我们是孤儿时》(*When We Were Orphans*, 2000)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不仅有了一个令中国读者倍感亲切的书名《上海孤儿》,译者还不辞辛劳地考据,将书中出现的Cathay Hotel(华懋饭店)、Bubbling Well Street(静安寺路)、Boone Road(文监师路)、*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等一系列令当今读者感到头痛的专有名词进行了还原和注解。《上海孤儿》的定名以及译者颇费周折地对旧上海所谓的还原,凸显了上海这座中国城市在石黑一雄小说中的重要地位,拉近了中国读者与当代英国小说的距离。译者的考据令笔者十分钦佩,但在几近完美的译本中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商榷:比如,Shanghai and Hong Kong Bank(汇丰银行)被译作“沪港银行”,Far East(远东)被译作“中东”^①。这两处瑕疵属于翻译研究探讨的范畴,对文学研究似乎并无大碍。但是,中译本中将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公共租界,或称英美租界)译作“外国租界”,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文学研究者去思考了。熟悉上海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上海孤儿》所浓墨重彩地书写的1930年代的语境中,上海租界主要由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和法租界(French Concession)构成^②,根据叶文心(Wen-Hsin Yeh)主编的《战时上海》等著述所提供的史料,两家租界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尽相同的。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法租界没有像公共租界那样在淞沪会战期间为躲避战乱的中国人提供有效的庇护,之后由于追随法国傀儡政府等原因,法租界还一度成为侵略者的帮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孤儿》所书写的主要是公共租界,因为上海公共租界的主导权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班克斯眷恋的并非是整个上海,而是上海的那一小片英国人牢牢掌握着话语权的公共租界。公共租界在《上海孤儿》这部小说中至关重要:淞沪会战之前,它是男主人公班克斯的精神家园;淞沪会战期间,它是上海所有人心目中的安全港湾。公共租界孕育着一种十分复杂的、风云变幻中的上海的家园政治,因此,结合历史语境,对《上海孤儿》中公共租界的重新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此种解读或许能为中国学者适度摆脱以“迷失、创伤、失败、错位和记忆”(Childs 133)为核心词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旅居者的精神家园

苏西拉·纳斯塔(Susheila Nasta)在《英国南亚族裔小说》中写道:“家园是人起始之地,不一定是人所属之地”(Nasta 1)。用这句话来描述《上海孤儿》中男主人公班克斯的心态可谓恰如其分。班克斯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迅速成为闻名遐迩的大侦探,在伦敦上流社会有了很高的声望。毫无疑问,班克斯的所属之地是伦敦,但他心里却一直不把伦敦当成自己的家。他心里一直挂念的是已然成为记忆的起始之地上海,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上海那一小片英国人掌握着话语权的公共租界。班克斯一直把上海的公共租界当成自己的家,在伦敦时如此,回到上海后依然如此。班克斯重返上海的时候,正是上海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公共租界里也是人心惶惶。班克斯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但他在战争爆发后依然不失时机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他对自己1937年来上海的选择无怨无悔,他对自己儿时的伙伴吐露了心声:“这些年我一直住在英国,却从未真正觉得那里是家。公共租界,那儿永远是我的家”(Ishiguro 274)。^③

《石黑一雄小说中无家可归的陌生人》一书的作者认为,《无可慰藉》中的瑞德和《上海孤儿》中的班克斯“展现了已成为孤儿的陌生人在迷失时间的迷雾里、在迷失的城市中寻找迷失的家园的欲望”(Wang 73)。这种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过分强调孤儿和迷失

是没有必要的。虽然“孤儿”一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石黑一雄小说的题目之中，但主人公班克斯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个孤儿，在孩提时代他父母双全，而且当父母失踪案真相大白之时，班克斯意外地发现，原来母亲还健在，她隐身在香港的修道院中。相比之下，倒是与班克斯有缘无分的女人海明丝以及班克斯收养的女童詹妮弗更像是名副其实的“孤儿”，而这或许正是小说英文题目使用复数（orphans）的原因所在。此外，把伦敦说成是迷失的城市似乎还在情理之中，但把上海说成迷失的城市就未免有些牵强。对于大侦探班克斯而言，伦敦是一座到处都潜藏着罪恶的城市。和伦敦相比，承载着他儿时记忆的上海、尤其是上海那一小片英国人说了算的公共租界，则是令人憧憬的、充满浪漫幻想的精神家园。

巴里·刘易斯（Barry Lewis）在《上海孤儿》出版的同年即指出：“石黑一雄的小说颇具说服力地展现了孩提时代”（Lewis 150）。这句话可谓是一语中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孤儿》的主要聚焦点不是已然长大成人、凭借侦探才能跻身于伦敦上流社会的班克斯，而是尚处孩提时代、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快乐成长的班克斯。孩提时代的班克斯有一个完整的家，父亲在一家染指鸦片贸易的跨国公司供职，而母亲则是反鸦片运动的主将，除了父母，班克斯家里还有一位积极支持反鸦片运动并致力于改善上海华人区生活状况的菲利普叔叔。

班克斯母亲积极投身反鸦片运动的行为，为旅居上海的英国人披上了正义的外衣。众所周知，鸦片贸易展示了大英帝国对华贸易中最不光彩的一面：中国的茶叶在欧美市场获利颇丰，为此，东印度公司迫不及待地寻找一种能够扭转贸易逆差的商品，而鸦片恰恰是这样一种能够迅速扭转贸易逆差的商品。东印度公司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把大量的鸦片走私到中国，吸食鸦片成瘾的中国人宁愿节衣缩食来换取鸦片，以致于道光皇帝慨叹：“鸦片将毁吾民之德”（Carp 23）。^④罪恶的鸦片贸易使中国人民深受其苦，但是，许多英文史书不关心中国人民的感受，片面强调鸦片在19世纪英国的合法性，把吸食鸦片描述成中国人的恶习，把鸦片战争的诱因说成是中国闭关锁国、特别是1793年和1816年两次傲慢地回绝英国特使试图建立正式中英外交关系诉求的结果（James 235-244），在某些西方史学家的眼里，仿佛英国人侵略中国是情有可原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倒成了一种愚蠢的行为，中国人之所以敢于反抗，是因为“他们不太知道我们的厉害，尽管他们表现得很勇敢”（James 240）。

《上海孤儿》和这种美化侵略者、贬低被侵略者的历史观有着一种共谋。石黑一雄借小说人物之口，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中国人、尤其是山东人吸食鸦片的状况：“山东鸦片成瘾的情况非常可怕，整村整村的人都成了烟枪的奴隶”（61）。耐人寻味的是，石黑一雄书写山东鸦片成灾不是为了批判英国人的罪恶行径，而是借此嘲讽中国人的堕落。由于吸食鸦片需要巨额资金支持，所以，来上海打工的山东人即便自己本性善良，也难免会因为他们的亲属而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检察官对班克斯的母亲描述山东鸦片成灾的状况，不是出于对中国民众的同情，而是在善意地提醒班克斯母亲要提防中国佣人，因为他们很可能因为家里有人吸食鸦片而经济拮据，而一旦陷入经济窘境，他们很容易做些偷偷摸摸的坏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班克斯家里的中国佣人没有偷偷摸摸的劣迹，倒是大英帝国的臣民班克斯和他的日本小伙伴山下哲有过潜入中国佣人田岭房间的偷偷摸摸行为。石黑一雄用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段为班克斯和哲的偷盗行为正名，他把田岭描写成吸血鬼伯爵一般的恶魔。田岭可以施魔法将人手变成蜘蛛，小说中关于田岭的那段描写极具哥特色彩，令人

毛骨悚然：

田岭发明了一种可以将剥下来的手变成蜘蛛的方法。在他屋里，有许多装着各种药液的小碗，他把收集起来的手泡到碗里，一泡就是几个月。慢慢地，那些手开始蠕动起来，先是轻轻地抽搐，而后是慢慢卷起，最后长出黑毛。这时田岭把它们捞出来，放它们出去，让它们像蜘蛛一样在小区里爬行。（93）

行窃之后，班克斯终于发现，田岭将人手变为蜘蛛纯属他的日本小伙伴的杜撰。中国佣人并不像公共租界里那些自认为比其他种族优越的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然而，在班克斯的内心深处，却总有着一种将上海进行等级划分的观念。在他的心目中，公共租界是令人眷恋的精神家园，而租界之外的华人区则是房屋低矮、疾病肆虐的污秽之地。

罗斯玛丽·乔治(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在《家园政治》一书中引用了一篇题为《家园：疆域的核心》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家园为个人以及被称为家庭的小团体提供三个方面的满足感：身份感、安全感和向上感”（George 11）。对于班克斯而言，上海的公共租界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身为英国人的他在有着“国中之国”之称的公共租界里有着一种特殊的优越感，英国在上海开埠之初，中国政府还掌握着租界的部分管理权，或者至少还有会商之权，但1854年开始，工部局成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吴志伟73），虽然租界内的税收主要来自华人纳税，1920年代起迫于各方压力工部局也吸纳了少量华人进入顾问委员会，但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权一直是牢牢地掌握在英国人手中。除了大英帝国公民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班克斯在公共租界范围内的安全感也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听大人的话，不越界进入“瘟疫肆虐、遍地污浊、恶人横行”（56）的华人区，他就永远可以尽情地玩耍。幼年的班克斯就有了一种向上感，这种向上感或曰使命感的源头来自他对母亲的崇拜。他一直把母亲当成伸张正义的女中豪杰，这也正是他不肯接受父母失踪真相的原因。在班克斯的想象之中，母亲肯定是由于投身反鸦片运动而遭人绑架，而父亲肯定也是因受母亲感化和贩卖鸦片的公司决裂才神秘失踪。成年之后的班克斯依然怀有使命感，他返回动荡不安的上海，其一是为了寻访父母的下落，其二是他自觉有能力为阻止上海的动荡做一些事。声名显赫的伦敦侦探又成了上海的旅居者，俨然一副战时上海救世主的模样。

二、战时上海的安全港湾

如果说战前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感只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安慰，那么，战时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安全感则更像是一种物质层面的客观存在。其实，战前的公共租界远非幼年班克斯所想象的那么安全：不仅租界内华人的安全得不到保证，连英国白人的安全也颇成问题。当绰号为黄蛇的神秘人物（其实就是菲利普叔叔）告知父母失踪真相的时候，班克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班克斯的父亲和情妇私奔，班克斯的母亲被一个叫顾汪的军阀绑架并沦为顾汪的小妾，菲利普叔叔因为得不到班克斯母亲的爱，反目成仇，和顾汪共谋实施了对班克斯母亲的绑架。租界的警察调查班克斯父母失踪案十几年未果，由此足见租界行政效率之低。在一个连英国白人都保护不了的租界里，所谓的安全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自慰。

熟悉上海租界史的人都知道，1845年上海租界设立之初实行的是华洋分居体制，“租

界内除了极少数原先居住在那里的本地居民和受外商雇佣的华人仆人，居住的全部是外国人”（马长林 34）。华洋分居时代的租界是地地道道的“外国人的城市”。后来，由于躲避战乱等原因，大量的华人开始涌入租界，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租界管理的难度，但也增加了税收，给租界带来了新的商机，工部局审时度势改变了对华人的策略，上海的租界进入了华洋杂居的时代。虽然租界并不能完全保证界内华人的安全，但许多中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把租界视作最理想的避难所。班克斯旧宅的新主人林先生就是把租界视为避难所的代表人物，他颇感自豪地告诉班克斯：“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公共租界里。父母为了逃避慈禧太后军队的追捕，逃到这个‘外国人的城市’里藏身”（200）。

在《上海孤儿》这部小说中，“外国人的城市”一词集中展现了中国人对公共租界的十分复杂的情感：虽然租界记录着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傲慢的洋人在内心深处有着一种令华人难以忍受的种族优越感，但对于林先生这样的人来说，租界是最好的避难所，他对这个保全了他全家性命的“外国人的城市”似乎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样，淞沪会战爆发后来租界避难的难民们对租界似乎也有林先生的那种感情。战争爆发之后，大量的难民涌入公共租界，租界的人口从一百五十万迅速增至三百万，一间普通的房子里要住三十一人。由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战争爆发后立即宣布中立，此外，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英美法三国战后立即向上海增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对于英美法还是不敢妄为，所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被所有人视为安全港湾”（Prologue 3）。

战时的租界不仅为平民提供了庇护，也为浴血奋战之后奉命撤退的中国军队提供了临时避难所。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之后，谢晋元奉命指挥军队撤入公共租界。南市沦陷之后，中国守军在征得法租界当局同意后，“卸去武装进入法租界”（余子道 张云 303）。《上海孤儿》没有涉及中国军人撤入租界的话题，也很少提及法租界，对于班克斯来说，英国人当家的公共租界才是他的安全港湾。一旦走出安全港湾，他的生命就可能受到威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把带他驶出租界的中国司机称为彻头彻尾的蠢蛋：

可是〔……〕上帝呀！我们真的已经出了租界？到闸北啦？嘿呀，你是个蠢蛋，知道吗？蠢蛋！你跟我说那房子就在附近。可现在根本找不着。很可能我们就在战区附近，太危险了。我们已经离开了租界！你是个地地道道的蠢蛋。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叫你吗？我告诉你。你明明不知道，却说你知道。不承认自己的缺点，狂妄自大。对我而言，这样的人就是蠢蛋。彻头彻尾的蠢蛋。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是一个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蠢蛋！（242）

中国司机好心好意地冒着生命危险带班克斯去寻找父母的下落，但因为驶出公共租界就被他臭骂一顿。司机有很多委屈，但班克斯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在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上海的语境中，唯有保持中立的租界里边才是相对安全的，窄窄的苏州河成为“两个世界的分界区”（Prologue 3），南岸的公共租界风平浪静，北岸的闸北战火正浓。

班克斯返回上海的初衷是寻访父母的下落并试图解决上海的问题。丽莎·弗伦特（Lisa Fluent）将《上海孤儿》中的上海问题归结为两点：其一是日本侵略；其二是“国际观察员明显的无动于衷”（Fluent 273）。作为公共租界的主导者，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曾经试图调停战事，但此时威风不可一世的日本根本不把已然没落的大英帝国放在眼里，

他们断然拒绝了英方提出的划上海为中立区、中日同时撤军、由英美法负责保护各国公民的提议。不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对曾经辉煌一时的大英帝国也不敢过于放肆，他们对于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还是有些敬畏的，对于英国人也还是客客气气的。日本军队在进攻四行仓库时遭到重挫，其一是因为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其二是那里离公共租界太近，他们不敢动用重武器或者用飞机狂轰滥炸。石黑一雄在创作《上海孤儿》时虽未亲临上海，但他对历史的还原能力还是令人钦佩的。他让班克斯阴差阳错地来到战区，目睹了中日巷战的惨烈，感受了中国军队的友好，也亲身体验了日本人对大英帝国公民残存的一点点敬畏。他落入日军之手后，日本上校亲自护送他返回租界。当他斥责日本侵略中国而造成血腥屠杀时，日本上校反唇相讥：“日本要想成为英国一样的大国，班克斯先生，这是必由之路”（297）。

直到1941年公共租界沦陷之时，租界的行政机关还在宣称：“这个国际机关的首要职责是服务于共同体”（Wasserstein 27）。租界宣称要保护界内各国人的安全，但租界内并不安全。虽然在战时上海租界被所有人视作安全港湾，但在这个安全港湾中，真正起了保护作用的恐怕不是租界这片地域，而是日本对以英国人为代表的洋人残留的那一点点敬畏。华人躲进租界也未见得安全，而洋人阴差阳错地越出租界也未见得就不安全。日本上校亲自护送班克斯返回公共租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班克斯信誓旦旦地要解决上海的问题，但他最终毫无作为。在日本威风不可一世、大英帝国已然江河日下的1930年代，班克斯和声称来上海阻止动荡、最终却沉迷于赌场的塞西尔爵士一样，踌躇满志却一无所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英国人自身的安危都难以确保，他又拿什么来拯救上海这个饱经战乱的城市呢？诚如布莱恩·芬妮（Brian Finney）所言，班克斯重返上海的壮举，不过是他想“把幼稚的幻想强加给这个真实的城市罢了”（Finney 145）。

三、孤儿、孤岛与家园政治

《上海孤儿》以公共租界为抓手，并借助孤儿与孤岛之间的张力，向世人展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风云变幻中的上海的家园政治。班克斯得知父母失踪真相并离开上海之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被迫撤出上海。上海沦陷之后，仅剩“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及两租界的越界筑路地区”（夏斯云等 220）未被日军占领，而这一小片未被占领的地区被称为孤岛。亚历山大·贝恩在《石黑一雄、上海与人道主义》一文中综合叶文心等学者的论述，对孤岛的涵义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孤岛既是“在暴力环境下能提供保护的绿洲”，又有“孤立、被遗弃和孤儿”的内涵（Bain 244）。历史学家通常是把淞沪会战结束作为上海孤岛时期的起点，但是，淞沪会战期间的上海租界已然具有了贝恩等学者所论及的孤岛的涵义。而且，由于孤岛时期上海租界经历了“由几个帝国主义共管的殖民地，向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逐步演变”（唐振常 798）^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淞沪会战期间的“孤岛”似乎比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孤岛更具有孤岛的涵义。

战时的上海租界是一片能提供保护的绿洲，而且此时此刻的班克斯正是孤儿感最强烈的时候。虽然在孩提时代的班克斯也很少走出公共租界，但那时候的他父母双全，他并没有被遗弃的感觉，而且，虽然人们把华人区描述成瘟疫肆虐的污秽之地，把华人女佣想象成能将人手变蜘蛛的恶魔，但事实并非如此。华人女佣不是恶魔，华人世界也并不像大人们描述的那么不安全。但到了战争爆发之时，父母已然失踪数年，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母亲尚在世上，为了将父母失踪案查个水落石出，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孤岛，到闸北战

区去探访他认为父母最终失踪的地方。在孤岛中的班克斯孤儿感异常强烈，为了消除自己的孤儿感，他必须走出孤岛这片能提供保护的绿洲。走出孤岛之后，他的孤儿感会淡漠一些，但他的安全感就会大打折扣。孤儿和孤岛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在战时的上海，只有孤岛才能有效地保护孤儿，但孤儿为了解开父母失踪之谜，又必须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孤岛。

除了孤儿和孤岛之间的张力，“孤儿”班克斯和他的日本小伙伴山下哲之间的恩恩怨怨似乎也很有深意。在孩提时代，在公共租界还是以英国为主导的列强共管的时代，班克斯和山下哲可谓两小无猜。到了班克斯父母失踪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因为相互误解而产生了裂痕。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山下哲成了日本军人，他在激烈的巷战中负伤，一群愤怒的中国民众要置他于死地，班克斯碰巧遇到，他蛮横无理地用枪喝退中国民众，把山下哲救了下來。山下哲苏醒后第一件事是让班克斯学几句救命用的日语。在孩提时代，在日本尚未横行于世、大英帝国尚能在公共租界里叱咤风云的时候，班克斯总是嘲笑山下哲说不好英语。而此时此刻，他们的角色颠倒了过来，为了在遭遇日本军人时活命，大英帝国的臣民班克斯不得不低下头来，十分笨拙地开始学习诸如 Tomodachi（朋友）之类的日语以备不时之需。

班克斯对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殊情感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家园政治。罗斯玛丽·乔治所提出的家园政治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但其核心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家园更多地是存在于意识层面，而非实体层面；其次，在家园政治的视域中，家园更多地是指和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文化空间；再次，家园在具有包容性的同时，也会带有一定的排他性。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自始至终把上海公共租界视为自己的家园，对他而言，精神层面的家园（公共租界）似乎比实体层面的家园（伦敦）更为重要，他对上海公共租界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上海孤儿》中虽然有少量将中国人妖魔化的文字，但石黑一雄似乎并无刻意诋毁中国人之意。他让主人公班克斯对上海公共租界饱含深情，借班克斯误入战区之际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友善和顽强，还在小说结尾用寥寥数笔对新中国的成就给予了礼赞：“在短短的几年间，共产党取得了慈善机构和各种热血运动几十年都未取得成就”（322）。

虽然石黑一雄似乎并无刻意诋毁中国人之意，但《上海孤儿》中潜藏着一股粉饰英国的暗流，英国人自始至终都扮演着一种文明使者的形象。《上海孤儿》中班克斯在公共租界里的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空间，而是和大英帝国相连的文化空间。乔治在《家园政治》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典型性的帝国式疑问：“如果没有英国，印度将会怎样？如果没有英国女人，大英帝国将会怎样？”（39）这个帝国式疑问是《家园政治》一书的立论之本，在大英帝国的视域中，英国不是侵略者，而是东方野蛮人的教化者。跟随丈夫来东方的英国女人是首当其冲的教化者，由于她们的丈夫担任着军政要职，英国女人在家里教化东方野蛮人的行为就有了一种浓浓的政治意味。简而言之，就是身在异国的英国女人是大英帝国的形象大使，她们不是侵略者，而是高人一等的西方文明的使者。《上海孤儿》中的班克斯母亲就扮演着这么一个西方文明使者的形象，她积极投身反鸦片运动，对每一个鸦片贩卖者都晓之以理：“先生，难道你不觉得羞耻吗？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作为一名英国人，一个还懂得礼义廉耻的人，为这么一家公司服务你不觉得惭愧吗？告诉我，靠这种不干净不净的财富生活，你真能心安理得吗？”（63）班克斯母亲全名是戴安娜·班克斯，西方学者将其与著名的慈善家戴安娜王妃相提并论，并据此将英国人在上海的行为标榜为人道主义干涉。亚历山大·贝恩在《石黑一雄、上海与人道主义》一文中指出，上海是“劳动、人权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的道德话语和西方公民意识相碰撞的地方”（Bain 245）。班克斯母

亲投身反鸦片运动是值得肯定的，英方试图调停战事的努力虽未成功，但同样是值得肯定的。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在保护中国军队以及平民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但是，仅仅因为这些，中国人就必须像《上海孤儿》中的林先生那样，操着满口的英语，对大英帝国感恩戴德吗？上海开埠后，曾经在广东以贩卖鸦片而闻名的怡和洋行就来上海开洋行卖鸦片，著名的沙逊洋行也是靠着贩卖鸦片起家^⑥。有一个投身反鸦片运动的英国女人，就可以抹平这斑斑劣迹吗？

在《上海孤儿》所着力书写的1930年代的语境中，翻开历史旧账、控诉英国侵略者的罪行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把英国人在上海的行为标榜为人道主义干涉也是不合时宜的。1930年代英国人曾经“看着他们富丽堂皇的大楼，对中国人不感激他们所赐的礼物感到吃惊”（Wasserstein 35）。这种心态让人想起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的那个经典的帝国主义之问：“我们为他们做了那么多好事，他们为什么不感激我们呢？”（27）由于中国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国人有时把问题更进一步：中国人享受着大英帝国的恩赐，又不需要履行殖民地的职责，他们为什么不感谢我们呢？《上海孤儿》没有直接提出类似的问题，但它用极其微妙的手法掩饰了大英帝国不光彩的一面，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凸显了诸如反鸦片运动、斥责日本暴行、保护中国民众等光彩的一面，藉此强化班克斯对公共租界的眷恋之情。

乔治在《家园政治》一书的引言中写道：“家园是确立差异的途径”（George2）。家园在具有包容性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排他性。班克斯所眷恋的上海公共租界就是一个包容性和排他性并存的地方。从华洋杂居时代开始，公共租界就不再是纯粹的洋人的世界，淞沪会战爆发之时以及孤岛时期的公共租界更是极具包容性，各派势力在租界内激烈角逐。但公共租界也有很强的排他性，虽然公共租界在中国人的土地上，但真正掌握话语权的却是洋人。而在所有的洋人中，又是英国人高高在上。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班克斯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大英帝国的自豪感，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横行一世的时刻班克斯已经无所作为，但他还是梦想着为他的精神家园做点儿事。同样，也正是由于英国人曾经在公共租界里高高在上，才使得班克斯这个主导着《上海孤儿》小说叙述的人，只把公共租界视为精神家园，他不仅对上海的华人区不屑一顾，连和公共租界相伴而生、1860年代才独立出来的法租界都不放在心上。

注解【Notes】

①详见石黑一雄：《上海孤儿》，陈小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213, 307。上述问题在2011年版中未见修正。

②详见吴志伟33-37。该书详细列举了1854年至1943年间上海租界的中英文名称，并对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定名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③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Kazuo Ishiguro, *When We Were Orphans* (New York: Vintage, 2000)，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译文由笔者自译。

④此处系英文翻译，并非道光皇帝原话。

⑤作者将上海租界说成是殖民地的做法颇值得商榷，但对租界演变过程的描述（即由列强共管到日本帝国主义独占）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⑥详见马长林 15-20, 143-14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ain, Alexander M.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Ishiguro, Shanghai, Humanitarianism." *Novel* 59.2 (2007): 240-64.
- Carp, Benjamin L. *Defiance of the Patriots: The Boston Tea Part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P, 2010.
- Childs, Peter. *Contemporary Novelists*. Second Edition.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Finney, Brian. *British Fiction Since 1984: Narrating a Nation*.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Fluent, Lisa. "Immaterial Labors: Ishiguro, Class, and Affect." *Novel* 59.2 (2007): 265-88.
- George, Rosemary Marangoly.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 Ishiguro, Kazuo. *When We Were Orphans*. New York: Vintage, 2000.
- James, Lawrenc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Abacus, 1998.
- Lewis, Barry. *Kazuo Ishiguro*.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P, 2000.
- 马长林：《上海的租界》。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
- [Ma Changlin. *Foreign Concessions in Shanghai*.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2009.]
- Nasta, Susheila. *Home Truths: Fictions of the South Asian Diaspora in Britain*.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Trans. Li K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Tang Zhenchang, ed. *A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89.]
- Wang, Ching-chih. *Homeless Strangers in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 Wasserstein, Bernard. "Ambiguities of Occupation: Foreign Resisters and Collaborators in Wartime Shanghai." *Wartime Shanghai*. Ed. Wen-hsinYe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23-38.
- 吴志伟：《上海租界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年。
- [Wu Zhiwei. *Foreign Concessions in Shanghai: A Critical Study*. Shanghai: Xuelin Press, 2012.]
- 夏斯云等：《上海近现代对外贸易史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 [Xia Siyun et al. *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odern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5.]
- Yeh, Wen-hsin. "Prologue: Shanghai Besieged 1937-45." *Wartime Shanghai*. Ed. Wen-hsinYe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15.
- 余子道 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Yu Zida and Zhang Yun. *The Japanese Assault on Shanghai in 1937*.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6.]

责任编辑：刘兮颖